

汪曾祺

废墟上一抹传统的残阳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划成右派。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汪曾祺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淳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在小说散文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本书是汪曾祺的传记文学。书中以第三人的视角,叙述了汪曾祺传奇的一生。书中同时附有大量汪曾祺的生活照片,还有汪曾祺的亲友对他的评述和追忆。

这里摘选的是汪曾祺在文化大革命前后参加戏剧创作和改编的一些经历。(摘自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废墟上一抹传统的残阳》)

六十年代初汪曾祺到北京京剧团,便和戏剧有了一段因缘际会的沉浮起落。

他进京剧团成了编剧,自然要写剧本,“文革”前有《王昭君》、《凌烟阁》和《小翠》;“文革”中除了著名的现代京剧《沙家浜》,还参与了京剧《杜鹃山》和《红岩》的改编,《山城旭日》、《草原火种》的剧本创作等;八十年代写过《擂鼓战金山》、《一匹布》、《裘盛荣》、《一捧雪》四个京剧本,后来还写过七个场戏剧歌舞剧《大劈棺》、电影文学剧本《炮火中的荷花》等。剧本不像小说,可以在案头或便时欣赏;如果剧本不能转为舞台表演,那作者几乎就是“白忙乎”。实际上,汪曾祺大多是“白忙乎”,那些剧本有的只演几场,有的则无疾而终。说起来,现代京剧《沙家浜》倒是最能代表汪曾祺

这个时期的创作活动。

从1963年下半年起,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关于京剧现代戏的大讨论。……随后,中宣部、文化部又联合发出通知,决定于1964年6月在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在这种形势下,北京京剧团接受了对沪剧《芦荡火种》的改编工作,这是江青直接插手样板戏的开始。

北京京剧团组织了四人写作班子,除了专职编剧汪曾祺,还有党委书记薛恩厚、业务团长萧甲、创作室主任杨毓珉,他们用一周时间,将《芦荡火种》改编为《地下联络员》。彩排时,江青并不满意,虽然当时北京市长彭真多加鼓励,但碍于江青的身份,也不便多说。于是,剧本进行了二次修改。

第二次改动比较细致,剧名也改回《芦荡火种》。据有关人士回忆,杨毓珉因病退出,剩下三人住到广渠门文化局招待所,每人分头改几场,由汪曾祺统稿,几场重头戏、一些重要唱段,都出自汪曾祺之手。

汪曾祺进京剧团后,是想有些作为的。京剧起源于民间戏班子,虽然含有非常优秀的东西,但文化根底的不足在京剧传统戏中表现也尤其明显,一些唱词甚至不知所云。他想提高京剧的文学水平,想把京剧变成一种现代艺术。除了进一步鲜明人物性格、彰显戏剧冲突,他还把改革重点放在唱词念白的文学性上。……“垒起七星灶”一段,汪曾祺曾戏言自己是玩数字游戏,是脱化于苏东坡的诗,可见他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一般西皮流水是七字一句,但汪曾祺认为五言才能烘托气氛,紧锣密鼓之后,将洞悉世态的“人一走,茶就凉”烘托出来。随着《沙家浜》传唱大江南北,这句词也广为流传,成为人所熟知的成语。彩排得到江青的认可,汪曾祺给她留下了印象。

《芦荡火种》参加了1964年夏全国京剧现代戏的观摩演出,当时还有《杜鹃山》、《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六号门》、《节振国》、《奇袭白虎团》等一大批现代京剧参演。在此期间,毛泽东看了几场戏,从艺术角度对《芦荡火种》提出几点意见,并将剧名改为《沙家浜》。剧本出版时,汪曾祺作为主创人员,名字排在第一位。

“文革”中,因为有前科,汪曾祺首当其冲被揪出来,大字报说他:“老右派,新表演”,接下来是批斗、抄家、游街……到后来,京剧团的“坏分子”被集中到一栋小楼里,学毛选、写交代材料、劳动。

到了1967年4月,汪曾祺被戏剧性地“解放”了。原来,江青将样板戏当做自己的阵地,要根据形式重新修改《沙家浜》,于是想到了汪曾祺。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络员派人找到汪曾祺,要他做个检查。汪曾棋正思索如何检查,又被叫到办公室,说表态就行了。就这样,当着临时集合起来的革命群众的面,汪曾祺讲了三分钟,表态说:“江青同志如果还允许我在样板戏上尽一点力,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晚,他和阎肃一起被派去陪江青看戏。然而为了这一句话,汪曾祺在“四人帮”倒台后“说清楚”时,检讨了无数次。这是后话了。



《汪曾祺——废墟上一抹传统的残阳》
大象出版社
作者:汪凌
定价:21.00元